

南昌起义后,宋任穷的绝密使命

宋任穷是湖南浏阳人,1909年出生,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这个正确的战略决策,还与宋任穷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委托传递密信有关。

接受秘密任务

南昌起义前,宋任穷所在的湖南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奉命和平江县的一个团一起赶往江西南昌,参加起义。但他们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时已是8月1日了,南昌起义指挥部和中共江西省委地下党派人找到他们,告知城里提前举行了起义,现今部队已经退出南昌向南进发了,工农义勇队就不要再进城了,等待下一步命令。

接到指令后,平江的工农义勇队不愿留下,返回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按照指挥部的指令,暂时驻扎在江西省的修水县和铜鼓县。

当时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有近1000人,700多条枪,下设3个大队,9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长是黄埔军校生苏先俊,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参谋长是罗纳川,浏阳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宋任穷担任文书并兼任一大队二中队党代表。

1927年9月初,在铜鼓驻扎的三团团党委派宋任穷和省委来的秘密交通员一起去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和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接到去南昌寻找中共江西省委的

命令后,宋任穷和交通员就出发了。他们到了南昌城外,住在一个地下交通点。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南昌城门口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交通员不让宋任穷进城,因为他说的是湖南话,非常容易暴露,让他在城外等候。交通员独自进城查了三天,省委曾经所有的地下联络点都去了,却都没找到人。交通员便让宋任穷撤离南昌回铜鼓,宋任穷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找到江西省委,领取部队下一步行动路线的指示,现在连南昌城都没有进去,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就这样回去。

宋任穷说服了交通员,带着他进城找中共江西省委,并答应说如果再找不到联系人,就出城回部队。

冒险与同志接头

进到南昌城里后,两人又去了一遍原来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些隐秘的联络点,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二人来到南昌城内绳金塔附近的一片很大的棚户区。交通员告诉宋任穷:“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各色人等出没,说不定能碰到要找的人,但这就要看运气了。”

宋任穷在绳金塔附近的棚户巷子中走着,仔细观察来往行人。突然,他看见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人,觉得面熟。就在这人回头的一瞬间,一个名字清晰地出现在宋任穷脑海里,他是共产党员刘士奇!宋任穷在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听过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刘士奇讲课。

白色恐怖之下,宋任穷不敢贸然跑过去与对方相互确认身份。宋任穷在他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对方意识到后面有人跟着,突然一拐,上了一个小竹楼的二层,撩开竹帘子就进去了。宋任穷赶紧跟着进去,可上到小竹楼二层却没见到人。

这时,店里一帘门帘掀开,出来一个店小二模样的人,问宋任穷是来喝茶还是来找人的。宋任穷猜出这里是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点,于是,他冒险直接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浏阳工农义勇队派来和中共江西省委联系的,刚才那个人是刘士奇,我认识他。我必须通过他找到省委,汇报浏阳团队的情况,领取指示后立即归队。”那人问了宋任穷现在住在哪里,说会把这些话转达,让他回去等通知。

在白色恐怖下,在还没有完全确认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没有接头暗号,宋任穷这一举动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但当时的时间和情况都不容再迟疑,他只能冒险一搏。万幸的是,这次宋任穷在绳金塔的寻找和小竹楼的冒险成功了。

后来,宋任穷由此联系上了参与南昌起义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人员实力及详细部署情况汇报给了他,并寻求省委的指示。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让宋任穷带密信前往江西莲花县一带,嘱咐他一定要把信亲手交到毛泽东手上,因为毛泽东会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由湖南前往江西攻打莲花县城。

将密信送给毛泽东

宋任穷怀揣密信出了南昌城后一路跋涉,几次遭遇险情,但都机智逃脱了,于9月25日赶到莲花县城。他在街上碰到了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一些人,由他们带到了设在莲花宾兴馆的起义军前委所在地。

当时,毛泽东正在宾兴馆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与其他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一些人主张按湖南省委意见,率部返回浏阳、长沙一带打中心城市;毛泽东则认为浏

阳、长沙一带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现在去打,打不下来,不同意这个意见。到中午时,前委会终于定下第二天秋收起义的部队由莲花出发开往湘南,等待接应南昌起义失败后由广东撤回的起义余部的行动计划。

就在此时,参谋进屋向正在开前委会的毛泽东报告,江西省委派人来,要亲手送交给他一封密信。于是毛泽东暂停会议,走出前委会议室,来到宋任穷面前。这是宋任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先向毛泽东口述了汪泽楷代表中共江西省委的口信,大意是:在罗霄山脉中部的江西宁冈一带和山上有共产党员掌握的百余人的队伍,有几十条枪,可去那里和他们汇合,具体情况可看密信。转述完口信,宋任穷拿出一张白纸,递到毛泽东手上,说这是密信,放入清水浸湿后,就可以显示出字来。

毛泽东仔细看完信后,就返回会议室,继续之前中断的前委会。他向另外4位委员传达了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说队伍将要出发前往宁冈,表明自己同意中共江西省委指示的态度。对此,有人表示了疑问:“刚才你还说同意去湘南抢占湘粤大道,迎接南昌起义从广东返回的部队,怎么现在转眼就又说去宁冈了?湖南省委的意见不是让部队返回湖南吗,怎么说变就变?”毛泽东耐心做大家的工作,说:“党的八七会议明确规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哪个省行动,就要听哪个省委的指挥,这是中央会议的规定。中共江西省委是依据现在变化了的情况,调整作出的决策。我们现在在江西境内,就应该听取中共江西省委的指令。”

9月26日,队伍离开莲花县城,向罗霄山脉的宁冈开进。10月7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与袁文才的部队会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茨坪,与王佐的部队会合,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纪元。

据《炎黄春秋》宋京波/文

朱元璋善待老人

说起善待老人的美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范例。他的孝道不但影响了后世子孙,还给清朝带去了“善老之风”。

“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这句话出自朱元璋一次祭祖后的感言,从中不难体味到他与其他皇帝的不同:祭祖不是“走马灯”式地应付,而是真心实意遵从孝道,以这样的精神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也正是因为朱元璋对于孝道的重视,在他驾崩后,他的陵墓被称为孝陵。

其实,在孝道与善老方面,朱元璋并不仅是嘴上说,更落于实处。在建立明朝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制度上着手,严格规束官员们的言行,其中对于老人的赡养及忠君孝亲等条例也包含其中。与此同时,在选拔官员时,还将善老问题提到考核层面,答不好“养老”这道题,甭想迈入朝廷大门。

此外,明朝初期,人们的晚年生活也得到了“有章可循”的保障。《明会典·养老》中记载,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一丁侍养,与免杂泛差役。”这成为明朝善待老人的基础政策。此外,对于鳏寡孤独老幼残者,“今特命有司存问于高年,恤鳏寡孤独者必得其所,笃废残疾者收入孤老,岁给所用,使得终天年。”

朱元璋之所以对老人特别关心,并制订了一系列关心老人的政策,是和他青年时期遭遇生活困顿的经历有关。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暴发瘟疫和饥荒,父母相继死亡。他身无分文,无法让亲人入土为安。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去,给了他们一块地,朱元璋和二哥才安葬了父母。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提出了“老有所养,死有所葬”,并将其写进了《大明律》。

据《北京晚报》京报儿/文